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隋唐五代

巴蜀書社

译注 张萍 陆三强

审阅 黄永年

唐才子传选译

寒 月 集

译注

张萍
陆三强

审阅

黄永年

已 卯 年 秋

一九九四年·夏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唐代是我国诗歌最兴盛的朝代，在将近三百年时间里，上自帝王将相，下则普通文人以至僧道，都喜欢写诗，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和杰出的诗篇。单就清朝人编集的《全唐诗》来说，就收了作者二千二百七十三人，诗篇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当然这还只能说是唐代全部诗篇的一部分，因为在这以后还不断有人搜寻唐代人的诗篇来补《全唐诗》，还有许多恐怕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战乱水火等灾害而毁失了。但仅就这保存下来的来看，可以看到其中绝大多数都具有鲜明的风格，创造出不同的流派。唐代诗人除了继承魏晋南北朝的五言古诗体外，还写出了大量气势雄伟的七言古诗，大量表现出音律美的五言七言律诗、五言七言绝句和五言

排律。可以说我国古典诗歌的格局基本上在唐代已奠定下来。以后宋诗固有其新的创造，元明清也出现过不少有才华的诗人，但总的说来还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很难超越唐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

唐诗数量既如此之多，艺术成就又如此之高，自然引起人们的爱好，都想进入这个园地欣赏盛开的百花。水平高的可以看上面所说的《全唐诗》，还有许多大名家的集子，如李白的《李太白集》、杜甫的《杜工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之类，读这些书有困难的可以读我们这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里的《李白诗选译》、《杜甫诗选译》……。这是一个方面。再一方面，古人说“知人论世”，还应该了解诗人们的生平、经历。因为仕宦显达的人写起诗来往往体势阔大，词藻富丽；屈居下僚甚至终身布衣的人写起诗来自然格调低沉，时有牢骚；志乐田园的写起诗来自然襟抱旷达，韵味清雅；涉足边塞的写起诗来自然气魄雄伟，心胸开展。这至少在封建社会都是如此，唐诗作者何能例外。因此在读唐诗的同时，读一点作者的传记就很有必要。

从哪里可以找到唐诗作者的传记？《二十四史》里的《旧唐书》和《新唐书》里都有一些。

《旧唐书》的《文苑传》里写了一百零五位文人的传，《新唐书》的《文艺传》里写了七十九位文人的传，当然这《文苑传》和《文艺传》里所记的人，有许多是重见的，还有许多人只长于文章而并不以诗见称，真正的诗人不过几十家。再加上没有写进这两种传而单独立传的像张说、张九龄、高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总起来也没有好多，满足不了读唐诗者的需要。到了宋代，在南宋初年有位叫计有功的编写了一部八十一卷的《唐诗纪事》，收集作者多到一千一百五十家，超过了《旧唐书》、《新唐书》立传的诗人十多倍。可惜这一千一百五十家中有许多只记他的诗，没有写他的传，有些虽写了传可太简单，往往只有几句话，叫人读了提不起兴趣。要使人读了有兴趣，而所记载的作者又不要像《旧唐书》、《新唐书》那样只有寥寥几十位，就得推在《唐诗纪事》以后出现了另一部专著——在这里要给读者选译的《唐才子传》。它的卷数看起来倒不多，一共才十卷，但每个卷的分量大，十卷一共收了作者三百九十八家，这在数量当然还不如《唐诗纪事》的一千一百五十家，可是除了附见姓名的一百二十家外，立专传的即有二百七十八家之多，每个专传少则一二百字，多的有一千多字，和《唐诗纪事》可

说迥然不同了。

这部《唐才子传》的作者姓辛，名文房，字良史，生在元朝前期，元人陆友仁写的《研北杂志》称他是西域人。西域在元人心目中是指的地方极为广大，除了我国今天的新疆自治区外，还包括中亚以至印度半岛、西亚、东欧、北非等地区。辛文房祖上生活在哪里已不清楚，想来应该是新疆、中亚一带吧？从他用“辛”这个汉姓，还起汉名并用字来看，这个家族应早已入居汉族生活地区，并且深深地接受了汉族的文化，所以辛文房本人才会以能用汉文作诗得名。当时号称“四大家”之一的诗人杨仲宏在诗集里留有《元日早朝，次韵辛良史》的七言律诗，另一位诗人张雨在所撰《勾曲外史集》里也有《元日雪霁早朝大明宫和辛良史省郎二十二韵》的五言排律。这里所说省是指元朝的中书省，叫“辛良史省郎”，说明辛文房曾在大都即（今北京）的中书省任职。辛文房自己也有诗集叫《披沙集》，同时诗人马祖常的《石田集》里就有一首《题辛良史披沙集》的五言律诗，可惜这《披沙集》早已失传，所以辛文房和杨仲宏、张雨元日早朝的唱和诗也看不到了。除了这部《唐才子传》，辛文房只留下一首题为《苏小小歌》的七言古诗和一首《清明日游太傅林亭》的七言绝句，都因为选

入元人苏天爵的《国朝文类》里才保存到今天。从这两首诗来看，多少有点中晚唐诗的韵味，这也是当时诗坛的风气。众所周知，宋诗经过北宋的苏轼、王安石，南宋的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大名家之后，已有走下坡路的趋势，所以元朝人又重新提倡学唐诗，尤其是学中唐晚唐诗。辛文房之所以要编写《唐才子传》，而且在《唐才子传》中对中晚唐诗人写得更详细，恐怕与当时的诗坛风尚和辛文房的个人爱好很有关系。他的大名文房同于中唐诗人刘长卿的字，他的字良史又同于中唐诗人于良史的名，如果是他自己后来起的，那应该也是同样的原因。

现在再讲这部《唐才子传》。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内容丰富。《旧唐书》、《新唐书》里的诗人传记不用说已全部被吸收进去，《唐诗纪事》中的资料也被充分利用。另外辛文房还认真阅读了这些诗人的作品，有些作品尤其是诗的题目里讲到诗人的出处经历，也都被作为充实传记的资料。再则唐代已盛行科举，文人要想做官多数先得考中进士科，所以唐朝人就编过十多种《登科记》、《科第录》之类的东西，专门记载哪一年哪一科录取了哪些人，主考官是谁，考题是什么，宋朝人也编过几部唐人的《登科记》，这些《登科记》、《科第

录》到元朝还保存了不少，所以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里都能一一写出这些诗人们是哪年中的进士科，有时还讲出这一榜的第一名即榜首是谁，主考官是谁，而这些在《旧唐书》、《新唐书》、《唐诗纪事》里都是很少提到的。以后到明代这些《登科记》、《科第录》统统失传了，清代学者徐松重新撰写唐代的《登科记考》，在很多地方转过来依赖《唐才子传》的记载，这也可说是《唐才子传》的一大功绩。此外，辛文房写《唐才子传》时还大量吸收唐人杂记小说中的资料，这些资料往往把诗人们的言行情态描绘得很生动，吸收这些资料大大地增加了《唐才子传》的可读性。当然，这些资料也存在着问题，即有时记述得不够真实，因为它毕竟是杂记小说而不是正式的史书传记，正式的史传有时还记载错，何况杂记小说？但即使这样，即使这位诗人并没有像《唐才子传》所记的说过这句话，做过这件事，并不能说在当时诗人中都不会这么说这么做，读者仍可从中领会唐代诗坛的风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不会有十全十美的完书。辛文房毕竟只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史学家，元代的学风又不像清代那样讲究考证，在《唐才子传》里引用杂记小说而未能去伪存真，只能算是一个缺点而不好否定辛文房在唐诗研究上的成就，更不能否定

《唐才子传》的整体价值。

《唐才子传》不仅内容丰富，在编写上也颇具条理。首先是诗人的姓名、字号、以及籍贯，有过科举经历的就记述中在哪一年，有时还说榜首是谁，主考官是谁，考不中的就说考不中。再是讲经历，做过什么官，仕途上一帆风顺还是困顿失意，是归老故乡还是逝世在任上。诗人如有好朋友的，还得讲他们之间的往来。有轶闻佚事，自然更在所必录。这些传有的写得详细，有的因资料缺乏比较简单，不强求一律。有些传后还加上一大段辛文房的议论，因为辛文房自己是诗人，所以这些议论也颇多精到之语，甘苦之谈，能做旧体诗的人读了会感到兴趣。此外，这部《唐才子传》在编排上也有独到之处，即除了开头对会做诗的唐太宗、玄宗、宪宗、德宗、文宗、僖宗六个皇帝写了篇“六帝”外，所有立传的诗人都按时代先后排列，而不考虑男女性别和其他因素，这在当时也可算是不容易的。因为封建社会里无论选诗或写传记，习惯上总是把僧侣和道士放在所有作家的后面，妇女更得放到最后。这有两个坏处，一是显得对宗教徒歧视，对妇女鄙视，再是这么做不利于对各个时期文学发展作全面的认识。在前此的《唐诗纪事》，以及后来的《全唐诗》，在编排上都免不了这个通病，而

《唐才子传》独能例外，不能不说是辛文房的卓识。

《唐才子传》在开头有辛文房在元大德八年甲辰也就是公元一三〇四年写的“引”即序言，大概《唐才子传》就在这时候全部写成。以后在元代就有刻本流传，到明代初年編集《永乐大典》时还把这《唐才子传》分拆开收了进去。以后不知怎么这部《唐才子传》在我国失传了，到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才从《永乐大典》中把《唐才子传》重新搜辑出来，编成了八卷，已不是原书全貌。但在日本却有元代刊刻的十卷原书保存着，日本人还多次重刻重印。到清代嘉庆年间日本用活字重印的本子传进我国，国内才流行开这十卷足本。以后我国阅读这《唐才子传》的人日渐多起来，鲁迅先生为有志研究我国古典文学的青年开列了十二种必读书，这《唐才子传》就居首位。最近几年来，国内几个出版社分别出了《唐才子传》的点校本或注释本，其中中华书局出版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能在史实异同上作精密的考订，更具学术价值。但这些本子只有文言文的原文，一般读者阅读起来会发生困难，因此我们撰写了这个选译本，列入《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让它能普及。

由于《丛书》的字数限制，我们这个本子只选译了一百位诗人，约当原书立有专传的三分之一略多一些，但一批著名的和比较著名的诗人都已基本入选。这些入选的传有的全译，也有的作了删节。删节掉的一是涉及神怪迷信的东西，古人讲点神怪是不必奇怪的，当时的科学不发达，唯物主义在人们头脑中还不很具备，今天再译这些就不太合适。再是有些传里引用了诗人或其友人的诗篇，这些诗篇如译成白话很难传神，因此遇到明白易懂的就既不删也不作今译，只加点注帮助读者欣赏，遇到文义艰深就索性删节不译。再则如前所说，传里有些记述因为用了杂记小说而失实，如失实得厉害，也给予删节不译，否则仍保存下来并译出，因为前面说过从这些记述仍可领会唐代诗坛风貌，删节不译反倒有点可惜。此外，辛文房所加的议论一般也删节不译，因为这些议论多数比较专门，一般读者不易领会也未必感兴趣。

《唐才子传》的原文用傅璇琮先生主编的《校笺》本，因为它作过认真的校勘，有些异文则择善而从，在这里不再注是据什么异本。注则要求简略而不事繁征博引，在史实有错误之处一般也不在注中作考订，因为考订起来非三言两语可了，而讲得太多又不合本《丛书》的体制。好在一般读者也未

必需要阅读考订方面的文字，如有需要可去查阅傅璇琮先生主编的《校笺》。

在每个传之前写有简短话，主要告诉读者此人的诗在《全唐诗》多少卷，以便有兴趣的读者去对照翻读这些诗作。

张 萍 陆三强

于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